

## 中西语境下“两种文化”冲突的比较分析

王 建 平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系, 湖南长沙 410002)

**[摘 要]** 尽管“两种文化”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但在中西语境下却有着不同的意义特征。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主义”的崛起,而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冲突,而中国尚缺乏这种平等对话的基础;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形成了两类明显对立的身份群体,而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明显高于人文,而在中国仍是人文具有最高价值。

**[关键词]** 语境; 两种文化; 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 冲突

**[中图分类号]** G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5-0006-03

1959年英国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激起世界性的普遍反映,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虽然迄今演讲已经过去50周年,有关“两种文化”冲突的论争也渐趋平缓,但并不意味着这一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所隐含的问题已经解决。而且,我们可以稍加追问的是,曾经引起热议的“两种文化”冲突的现象在我国是否真正存在?与西方比较起来,“两种文化”冲突是否有着相同的本质内涵?抑或在我国“两种文化”冲突有着怎样的表现特征?显然,对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进行语境意义上的分析与探讨。

一 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主义”的崛起,而中国尚无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的出现是与实证科学占据统治地位分不开的。在实证主义科学的视野中,经验事实成为科学所唯一关注的对象,而逻辑则成为分析和推断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基本工具。实证主义科学排斥人的情感、意志、信仰等主观因素,主张“价值无涉”,认为所有关于事实的知识都是客观的,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本质特征。20世纪初,随着科学和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科学技术所取得的物质成就的充分凸现,推崇实证主义科学成为压倒性的主流。

实证主义科学在将科学的方法归结为实证的方法,将科学精神归结为实证的精神,将科学推崇为真正知识的唯一来源,将科学方法看作是唯一可靠的方法时,它实际上走向了“科学主义”。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尽管可以追溯到培根,经过笛卡尔的数学化法则的推动,到实证主义科学形成时则发展到了顶峰。并在20世纪初期便开始取得了话语霸权的

地位。在科学主义语境中,科学被认为反映了自然的本质规律,是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科学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科学的”成为“正确的”的代名词。

“20世纪上半叶,在大学中引发科学与人文对立的根源,恰恰是试图雄心勃勃地统一整个知识领域的科学”<sup>[1]</sup>,科学主义用自己所强调的实证性、逻辑性和客观性等标准来衡量其他一切学科,并把自然科学的一套研究方法和逻辑体系宣称为一切学科所要遵循的普遍范式,从而使人文学科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人文学科甚至被称为“次等学科”,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这种“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思潮成为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主流,从而引起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

我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科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民主”的大解放,并迅速取得了思想支配地位,一度也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的迷思。用胡适的话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sup>[2]</sup>。科学取代了旧经学成为了一种新“经学”。

“唯科学主义”思潮在当时中国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从最早的“中体西用”到“科学救国”乃至“全盘西化”的形成,无不体现了对科学的推崇与膜拜,对科学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进步的渴望与向往,于是科学泛化为一种“主义”,演化为“科学万能论”。但这种“唯科学主义”思潮,与西方的科学主义并不相同。西方的“唯科学主义”基本上没有跃出“知性”领域和方法论层次,是一种对科学理性的偏执、迷恋;而我国的“唯科学主义”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破坏基础上的一种对科学的“崇信”,一种对技术的崇拜,而并不表

**[收稿日期]** 2009-08-12

**[作者简介]** 王建平(1968-),男,湖南武冈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现为科学实证、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弘扬,恰恰相反,这些方面在我国至今发展得仍很不够。在“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下,救亡图存的现实推动,科学被视为形下之术,只有器物层面上的价值,科学也只有工具性意义,科学思想、科学理性难以得到健全发展。“崇尚科学”也只有形式上、口号上的意义,而并没有占据一般的思想基础。所以,在我国与其说是“科学主义”的强旺,莫若说是“技术主义”更为恰当。由此,在“两种文化”冲突的发生基础上,中西方是有所不同的。

二 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冲突,而中国尚缺乏这种平等对话的基础

可以说,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冲突,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均已强大发达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两种对峙的话语力量。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希腊时期所开创的理性与实验传统是他们科学发展的精神源泉。“西方哲学和理性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作为科学形态而存在,它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思考自然界和宇宙整体的存在发展问题,突出地体现出对于自然世界和知识作为统一整体而系统认知把握,对于宇宙系统和自然规律严正关切的思想认识态度和精神倾向”<sup>[3]</sup>。科学文化经过希腊时期的萌芽、近代社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已成为人类文化园中璀璨夺目的奇葩,并对人文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就在实证科学取得了话语霸权并把它宣称为唯一正确的真理时,遭到了一部分人文学者的激烈反对与批评。挑战实证科学的权威,弘扬人文科学与人文精神,是这些学者的共同目标。其时,与“科学主义”相对的“人文主义”也悄然兴起,形成了两种思维方式、话语模式、研究范式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纷争与对立。如在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提出了一个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精神科学的概念,并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也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进行了划界。他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两大类,阐发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在本质上和方法上根本对立的观点;非理性主义哲学大师尼采对非理性的“强力意志”的强调,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对欧洲文化,特别是理性主义的猛烈抨击,对科学主义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论述了作为欧洲人根本的生活危机之表现的科学危机,对实证科学占主要地位的科学文化也进行了直接有力的批评。

20 世纪以来在西方尽管科学主义占据了主导,但人文主义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渐成声势,有效抵制了科学主义的恣意横行和促使人们进行积极的反思。“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对等的、相激相促而成的,是两种特有的话语范式的权力之争。而我国科学文化十分不发达,长期以来科学精神一直欠缺,而固有的人文主义传统在上个世纪又遭到否定、批判和践踏,科学被抽离为技术,人文被窄化为政治,造成科学与人文实质性的割裂。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尽管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这种分裂极为畸形,表现出来的是科学与人文的极度不对称:科学压倒一切,人文

势单力薄。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科学一开始就是被‘功利主义’地传入,传入以后又被‘功利主义’地培养,而它本来固有的人文土壤和根基移植不足。中国本土的人文土壤与外来的科学产生严重的‘排异性’,结果遭到猛烈的侵蚀和破坏。于是,在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与科学相应的人文发育严重不足,中国固有的人文日益衰微,科学与人文严重失衡。”<sup>[4]</sup>科学与人文之间也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基础,科学的强势表现为技术主义的涌动,对科学产生的结果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科学文化的丰富和科学精神的显发,这种技术理性的主宰、功利的趋从与失落的人文之间形成了我国“两种文化”冲突的特有概貌,是一种源于追寻失落的人文精神的痛彻呼喊。

三 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形成了两类明显对立的身份群体,而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

斯诺的长篇演讲深刻地分析与揭示了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两种文化的分裂现象——即文科学者和理科学者之间缺乏相互了解,甚至彼此怀有敌意。“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而在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他们对对方存有偏见,他们的态度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在情感层面上也找不到共同之处”<sup>[5]</sup>。

作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代言人,理科学者与文科学者的矛盾裂痕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由于双方的不宽容和科学正在迅速地发展这一事实,这种分歧只能加深。”<sup>[6]</sup>科学家认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都是一些毫无用场的梦想家”,科学技术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真正武器,人文学家的精神产品无助于改变社会现实;而“那些傲慢的文人们,即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喜欢宣称他们起的作用更高级更重要,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正是生命中永恒的要害,而科学家们所关心的只是瞬息万变的事物”<sup>[6]</sup>。

这两种不同的身份群体在当时是极具典型性的,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被分化成两极群体,因为当时科学主义的高视阔步与人文主义的低沉呐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归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维护自己的学科使命与尊严,但在科学主义占有强势地位、人文学科被殖民化的情况下,他们的矛盾被激化了,沟壑在加深了,这两个群体“他们的才智接近、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差不多,但却几乎没有什么沟通。他们在学术、道德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共同点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从柏林顿馆或南肯辛顿到切尔西就像远渡重洋。”<sup>[5]</sup>

我国的学科知识领域是否也形成了这样对立的两极群体呢?我认为在中国并没有典型的、鲜明的两极群体的出现。尽管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科玄论战”,可以看成是对分化成两极群体的最好注解,但这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幕情景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西方文化的严重危机,使曾经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发生了分化,产生了

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分歧,科学派与玄学派的论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所引起的”,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一次较量。所以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科学和科学的限度问题,而并不是学科领域的范式之争的问题,因此在整体层面上并没有分化出有着不同的思维和言说方式的两类群体。

我国并没有出现两极对立的身份群体,是跟我国的科学文化与科学教育的不发达、人文教育的政治化有联系的。在强意识形态控制下,不但人文教育走向狭隘的政治化轨道,就是科学教育也不可避免地政治化,学者的情感归属、身份认同无不披上了政治色彩,他们失去了自己重要的学科人格和学术风格。所以,就没有出现学科意识主宰下的两极对立的身份群体。

四 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明显高于人文,而在中国仍是人具有最高价值

尽管西方几百年来强大的人文传统与迅速发展的科学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主政治、法治思想都对西方科学可能的僭越设定了基础,但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的技术成就和实用价值进一步显露,大学与工业化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科学的专门化、专业化进一步增强,科学教育不断受到重视,日益走向大学教育的中心;人文教育开始受到冷落,昔日的中心地位不再存在,科学与人文的裂缝也在逐渐的加深。

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取得了话语权力,并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在科学主义语境中,将知识分成层级,物理科学最高,生物科学次之,社会科学再次之,而伦理学、美学等人文科学甚至不能进入知识的殿堂,自然科学的强势与标准作用凸显。尽管遭到了人文主义的有力抵抗,但终究难以达成有效的平衡。

应该说,西方文化的外倾精神有助于系统科学的发展,它谋求进取,有强烈的探寻外在世界、征服自然的欲望。而运用理性以获得真理是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的一贯精神,是外在超越的西方价值系统的一种具体表现。理性的运用与发展是近代科学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也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所以,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由科学作支撑的,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只是当这种科学不再执着于关于世界真、善、美精神和价值的统一性,使真、善、美发生价值与意义的偏离,尤其在“求真”的同时否定“求善求美”的重要性,并宣称“科学”才构成真正的知识时,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总的说来,科学性作为西方文化中的基本元素和得以生长的基始力量,科学是高于人文的,“西方人文研究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奉科学知识为典范的基本心态”<sup>[7]</sup>。

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属于“主德”的文化,西方文化属于

“主智”的文化,中西文化传统最重要的不同体现于德性文化与知性文化之间。重道轻艺、重德轻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当科学最初传入我国时,“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足以表明这一点。因为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文文化,是一套以人伦道德为中心而构建的知识体系,人文具有最高价值,科学的技术性利用只能作为人文的附属与补充,科学是第二性的、次义的。

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历来缺乏科学精神,正是对科学的技术性理解和运用,导致我国的科学文化迄今仍没有发达起来,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仍然难觅其迹。尽管20世纪初期以来我国科学主义思潮流行,尽管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都缺乏一种适宜科学发展的环境空间,而且突出科学的实用价值,科学被抽离为简单的技术向度,科学始终难以生长为一种与人文对等的力量,人文的价值远高于科学之上(尽管特殊条件下人文纯化为政治)。所以,极端需要科学又视为等而下之,这是上个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一个悖论。

审视中西语境下“两种文化”的冲突问题,必须指出,由于我国科学文化尚处于一种不发达的水平,科学理性、逻辑、实证等亦很不足,而是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恣意横行,功利主义的侵袭蔓延,造成对文化的根本损害,而并没有形成两种学科领域的话语范式的纷争。所以,在我国不能说是科学主义对人文的规训与僭越,也不是人文主义对科学的分庭抗礼,我国“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一种潜在的冲突,是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之间构成的一种紧张关系,是中西文化碰撞与矛盾的展现,是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理性与精神文化的冲突,是对失落的人文精神的一种追索。总之,与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不太一样的。只有对此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方可更好地促进我国两种文化的交融、协调、和谐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阎光才. 大学的人文之旅[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47.
- [2] 张君勱等. 科学与人生观[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2-3.
- [3] 何云坤. 科学进步和高等教育变革史论[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111.
- [4] 吴国盛. 让科学回归人文[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序): 2.
- [5] 斯诺. 两种文化[M]. 陈克艰等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 [6] [美] 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 陈恒六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7] 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518.

(下转第12页)

- 社, 2007: 30-39
- [5] 吴 辉.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党的建设[J]. 理论前沿, 2004(10): 29-31.
- [6] 吕素香. 新时期共青团组织的职能定位与核心竞争力[J]. 中国青年研究, 2006(8): 31-33.
- [7] 张 伟. 新时期共青团职能定位的思考[J]. 中国青年研究, 2003(8): 76-79.
- [8] 袁宝成.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共青团工作的启示[J]. 中国青年研究, 2003(9): 39-42.
- [9] 王思蔚. 新时期“党建带团建”工作意义探略[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3(4): 27-31.
- [10] 陆士桢. 共青团十六大报告精神辅导读本[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 [11] 陆 昊. 以最大的决心支持和推动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工作, 切实增强对广大青年的吸引和凝聚[J]. 中国共青团, 2008(9): 4-9.
- [12] 胡锦涛. 胡锦涛的讲话[N]. 中国青年报, 2008-06-15(1).
- [1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08-07-23]. <http://tech.sina.com.cn/focus/cnnic22/>.

## The Rise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LIGuo-rong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6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civil society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moder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hallmark of Chinese development. Featured by mass volunteering and nonprofit character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organizations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a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high political nature, powerful administration and special management mechanism. Therefore,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organization of the League in the civil society, the Leagu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led by the Party construction, be involved into the civil society, be clear about its posi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e its management as well.

**Key words** the civil society;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basic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of the League construction

(上接第8页)

##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s

WANG Jian-ping

(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 Changsha 410002, China)

**Abstract**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are of great difference in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s though they are a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west arise as a result of the advance of “scientism” while there is no “scientism” of real meaning in China. The above-mentioned conflicts in the west take place among parties of equal status whil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basis for such an equal interaction is still of absence.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western context result in two social groups with opposing standings which do not emerge in China.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west occur due to the fact that science predominates over humanities while in China the latter predominates over the former.

**Key words** context; Two Cultures; scientism; humanities; conflicts